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

浙

浙江丝绸文化史

Zhejiang Sichou Wenhushi

袁宣萍 徐铮 著

江

杭州出版社

浙江丝绸文化史

袁宣萍 徐 铮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丝绸文化史/袁宣萍,徐铮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80758 - 027 - 0

I. 浙… II. ①袁…②徐… III. 丝绸—文化史—浙江省
IV. TS14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213 号

浙江丝绸文化史

袁宣萍 徐 铮 著

本册责编 汤 敏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 编 310007 电话: 0571 - 87997719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8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8 - 027 - 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陈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先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

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士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

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曙光初现

——史前时期的浙江丝绸 (1)

- 一、杖首上的蚕纹 (1)
- 二、最早的纺织品 (4)
- 三、丝衣玉饰 (5)
- 四、起源契机 (8)
- 五、传播之谜 (13)

第二章 吴越桑曲

——先秦时期的浙江丝绸业 (15)

- 一、又现钱山漾 (15)
- 二、吴越滥觞 (17)
- 三、扬州贡织贝 (19)
- 四、丝绸业与霸业 (20)
- 五、剑与丝 (22)

第三章 走出低谷

——汉晋南朝的浙江丝绸 (24)

- 一、相对沉寂 (24)
- 二、孙吴经营 (27)
- 三、走出低谷 (29)
- 四、聘问海南 (32)

第四章 崛起东南

- 隋唐五代的浙江丝绸 (34)
- 一、神奇的耀光绫 (34)
- 二、崭露头角 (37)
- 三、崛起东南 (39)
- 四、我且闭关修蚕织 (44)
- 五、海陆丝绸之路 (48)

第五章 走向辉煌

- 两宋时期的浙江丝绸 (50)
- 一、鼎立之势 (50)
- 二、重心南移 (54)
- 三、千年《蚕织图》 (60)
- 四、都市繁胜 (64)

第六章 江南丝府

- 元代的浙江丝绸 (68)
- 一、新征服的土地 (68)
- 二、产区变迁 (71)
- 三、发达的官营织造 (76)
- 四、天城记忆 (81)
- 五、贩丝海外 (83)

第七章 湖丝遍天下

- 明代的浙江丝绸 (86)
- 一、湖丝遍天下 (86)
- 二、繁荣的丝绸市镇 (90)
- 三、先进的技术 (95)
- 四、红门局变迁 (101)
- 五、海禁与贸易 (105)

第八章 落日辉煌

- 清代的浙江丝绸 (111)
- 一、康乾盛况 (112)
- 二、战后格局 (120)
- 三、近代缫丝业兴起 (128)
- 四、最后的官营织造 (132)
- 五、局织与民织产品 (137)

第九章 工业化进程

- 民国时期的浙江丝绸 (144)
- 一、兴衰变奏曲 (144)
- 二、产业革命 (148)
- 三、丝绸品种创新 (154)
- 四、教育、人才、实业 (157)
- 五、丝绸贸易 (165)

第十章 蚕花烂漫

- 浙江丝绸风俗与传说 (174)
- 一、蚕神崇拜 (174)
- 二、神圣的蚕月 (179)
- 三、蚕乡节日 (183)
- 四、传说与文学 (188)
- 五、瓯绸恋歌 (191)

第十一章 《蚕织图》及其流传 (193)

- 一、楼璘及其《耕织图》 (193)
- 二、南宋《蚕织图》的重要版本 (195)
- 三、宋以后《蚕织图》的版本流传 (199)
- 四、《蚕织图》在国外 (203)
- 五、有关吴本《蚕织图》的几个问题 (206)

附录一 浙江湖州南浔丝车调查	(209)
一、南浔丝车分析	(209)
二、南浔丝车缫丝工艺	(211)
三、南浔丝车探源	(214)
附录二 浙江历代蚕桑丝绸著作	(216)
一、早期蚕桑丝绸文献	(216)
二、宋元时期的蚕桑丝绸著作	(217)
三、明代蚕桑丝绸著作	(220)
四、清代蚕桑丝绸著作	(223)
五、民国时期的蚕桑丝绸专著	(229)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33)

第一章 曙光初现——史前时期的浙江丝绸

1926年，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中国考古学前辈李济博士带领一批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一个属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此为国内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一个令人意外的收获，是出土了半个茧壳。李济先生后来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这一正式发掘报告中写道^①：

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前期，距今约5000年。半个茧壳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虽然有一些争议，但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中国蚕丝业起源的重要物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传说黄帝的元妃嫘祖发明了养蚕治丝的方法，历代统治者也将嫘祖奉为“先蚕”进行祭祀。远古的传说加上半个茧壳的出土，一时间黄河流域是中国蚕丝业发祥地的说法似乎成了公认。然而，亘古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的长江，是否也同样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特别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那一片美丽富饶的平原上，是否也一样地诞生过功被千秋的原始蚕桑业？浙江省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发现，为解答这一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杖首上的蚕纹

1972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在宁绍平原的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

^①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上，后来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目前的发现与研究已经表明，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浙江宁绍平原、姚江两岸直至舟山群岛一带。根据河姆渡文化的地层关系，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目前基本上将其分为四期。^①第一期文化的年代距今7000—6600年，第二期距今6600—6000年，第三期距今6000—5700年，第四期距今5700—5300年。其中第一期与第二期河姆渡文化的特征最为典型，第三期出现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的影响，第四期又显示出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某些特征。

在第一次发掘时^②，于第四层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遗物，有玉石器、骨器、角器、木器、陶器等，其中骨角器是河姆渡遗址第一期遗存的主要内容，出土近700件，最重要的农业工具是骨耜，它的出土说明7000年前的宁绍平原已经进入翻土耕种的定居农业阶段。此外，木器也是河姆渡第一期遗存中数量较多的器物，其中一些器具可能与纺织有关，如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说明河姆渡人已经开始了纺纱织布的原始手工业。1977年冬开始第二期发掘^③，又出土了一个牙雕杖首。这个牙雕杖首特别的地方，是它上面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四条虫纹。这四条虫纹非常像蚕，看起来好像正在向前蜿蜒蠕动，头部和身上的横节纹明显。另外还有一件陶片上绘有昆虫吃叶纹，虫体弓背屈体，沿着叶的边缘吞食，形象逼真。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何要在他们的器具表面绘上昆虫纹呢？这种昆虫与他们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联系呢？



图1：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蚕纹牙雕器

从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看，距今7000—6600年前的浙江宁绍平原气候远比今天温暖湿润。这是一片平原湖沼与丘陵山地穿插的地带，山上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象、犀牛等热带动物在森林与湖边出没，生态环境十分优越。河姆渡人从事采集与渔猎活动，各种食物来源丰

① 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③ 河姆渡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富。从出土的大量骨耜等农具、厚达 20—50 厘米的稻谷堆积层来看，他们已经开始栽培和种植水稻，并饲养猪、狗、水牛和羊等家畜。他们盖起了有湖沼水乡特色的木结构架空住房——干栏式建筑，遗址中发现的各种榫卯木构件，说明他们在建筑方面颇具才能，已经脱离了原始的捆扎联结。他们制作陶器，用竹条编织各种器具，更重要的是，他们用陶制的纺轮、骨制和木制的机具像模像样地进行纺纱织布了。总而言之，河姆渡人已经进入农耕定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富足而安闲。



图 2：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器上的双凤朝阳图



图 3：刻画猪纹的黑陶方钵

河姆渡人的精神生活可以从他们留下的装饰艺术品中见到端倪。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鸟纹和鸟的形体为主题装饰的器物，其中以“双凤朝阳”的象牙器、骨匕上的连体鸟纹和象牙鸟形匕等，构图和刻画最为精湛。其次是豕纹和豕形体装饰，最有名的即一个刻有豕纹和植物禾纹的黑陶方钵，此外还有一些鱼、兽等动物陶塑。在远古的河姆渡时代，已经诞生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因此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器具上刻上某种动物，绝不是为了审美，而是表达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信仰。目前学术界基本上公认，鸟崇拜是东南史前部落最普遍的原始信仰，并与太阳崇拜密切相关，而豕则与水、雨等自然力密切相关，是农业定居时代产生的一种观念，因此河姆渡人是以鸟、太阳、豕、禾等图像来表达自己对天地的敬畏与未来的期盼。那么，牙雕杖首表面上刻着的四条蠕动着虫又代表着什么呢？

显然，那绘在牙雕杖首上的蠕动着生物也不是一般的昆虫，如果不是与河姆渡人的信仰或生活密切相关，人们是不会去刻意描绘外形并不讨人喜爱的毛虫的。据推断，这四条虫很可能正是蚕。六七千年前的姚河两岸树林茂密，其中定有不少野生桑林，生活着大量吃桑叶的野蚕。这种蚕儿必定与河姆渡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保守地讲，或许他们还不懂得将野蚕进行人工驯化饲养，并将蚕茧抽丝织绸，然而离这一步应该不是太遥远了。

从河姆渡人的生活状态看，7000 年前浙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已经出现

了先进的农耕文化，长江流域当之无愧地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河姆渡牙雕杖首上的蚕纹与山西西阴村的半个蚕壳一样，分别在南北两端让我们看到了中华大地上蚕丝业起源的曙光。

二、最早的纺织品

与浙东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平行发展的是浙北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以1959年发现于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的史前遗址而命名，其分布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对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晚期文化也产生过影响。^① 遗址主要分布在浙北苏南，即浙江桐乡、嘉兴、吴兴（今湖州）、余杭以及江苏梅堰、吴县、常州、武进，上海青浦等地。马家浜文化根据其地层关系和出土文物测定，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在距今7000年左右，第二期在距今6700年左右，第三期在距今6400—6000年。^②

与浙东宁绍平原一样，浙北的太湖流域也有优越的生态自然环境，这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网交错、植物繁盛，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里的人们与同时期的河姆渡人一样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不多，也种植水稻，饲养家畜，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有一定比例。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大量陶制的纺轮等生产工具，说明当地纺织技术的存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属于马家浜文化三期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在其第十层地层中，发现了三块已经炭化了的纺织品实物，经鉴定后确定其纤维原料是野生的葛。尽管草鞋山在苏南，发现的也不是蚕丝织物，但草鞋山与浙北杭嘉湖地区同属马家浜文化圈，其生产发展水平是相当的，而且它毕竟是中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最可靠的纺织品实物。根据考古发掘报告^③，草鞋山的纺织品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其密度是经线每厘米10根，纬线每厘米罗纹部分为26—28根，地部为13—14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所织花纹虽然简单，但说明马家浜人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的经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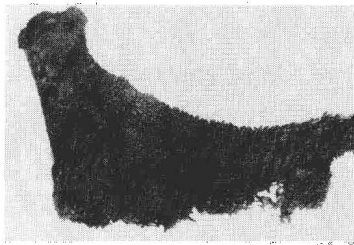


图4：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葛织物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② 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交织，不但纺纱与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且在审美上也有了更多的追求。

马家浜文化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是以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中层文化遗存作为其代表性遗存命名的，其分布范围与马家浜文化一期类似，在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多有发现，时间跨度为距今 5900—5200 年。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看，崧泽文化也以水稻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其社会形态在马家浜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虽然没有像草鞋山遗址一样出土纺织品实物，但推测其纺织技术不会落后于马家浜文化已经达到的水平。

有意思的是，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所代表的浙北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持续地对浙东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产生影响。在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和第四期，马家浜与崧泽文化的因素在出土遗物中明显体现出来，可见五六千年以前浙江大地上就已存在史前文化的互相交流。但河姆渡三期与四期文化仍然具有自己的特征，这说明即使在浙江这片不大的土地上，史前文化也是多元发展的。1990 年浙江萧山又发现了跨湖桥遗址，年代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一期相当。一个个新的发现更新着人们的认识，虽然目前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仍有争议，但我们相信，浙江文化的源头必将在不断的发现中逐渐清晰起来。

三、丝衣玉饰

继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后，浙江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文明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便是良渚文化，其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 5200—4000 年之间。

良渚是杭州北部的一个小镇。1936 年，供职于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1911—1939）在浙江省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发现了数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并主持了几次小规模发掘，出土过一批丰富的史前遗物。1958 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良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新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黑陶、相关农业工具及水稻遗存。1959 年 12 月，我国考古界先辈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过一系列调查与研究，发现在良渚周围地区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的新石器遗址群，良渚文化的整体面貌得以逐步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与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一样，都为环太湖流域，而以太湖流域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遗址分布最为集中。浙江是良渚文化遗址发现最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太湖以南的杭嘉湖平原一带；其次是宁绍平原，在文化上受到太湖流域的影响。根据当前的发现与研究，学术界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距今约 5200—4800 年，中期距今 4800—4400 年，晚期距今 4400—4000 年。^① 从 7000 年前的马家浜文化起，中经崧泽文化，浙北杭嘉湖平原上的新石器文化经过了 2000 年的培育和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已十分发达。从目前发掘的遗址与出土文物看，良渚文化已经有一套以玉器和祭祀为中心的完整的礼制形式，祭祀活动非常频繁，社会组织形态已经进化到邦国的阶段，出现了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即从原始社会跨入了文明社会的行列。良渚文化有着十分先进发达的稻作农业，良渚先民凿井而饮，构木而居，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稻作农业从早期的耜耕发展到犁耕，大量出土的石犁，证明了这一农业文明史上影响深远的伟大创举。正是犁耕，带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良渚文化最突出的是先进的治玉工艺，代表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水平，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玉文化”。而漆器、纺织、象牙器、酿酒、造船业等手工业，也无不具有令几千年后的人们惊讶不已的高超技艺。众多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表明，良渚文化是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灿烂之花，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一个重要源头。

要探究中国蚕丝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土于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的丝织品了。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湖州（旧称吴兴）市南 7 公里处，这是一块太湖流域的冲积平原，其间河道密布，水草茂盛。其中一段水域，因西面的一座小山——钱山而取名钱山漾，其实是东苕溪的一段。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经德清县北流至湖州城安定门，与西苕溪汇合向北注入太湖。



图 5：钱山漾遗址

^① 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最早对钱山漾产生兴趣的是一位热爱考古的学者——慎微之（1896—1976）。慎微之是湖州人，留美哲学博士，归国后曾先后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务长，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职。20世纪初，钱山漾已引起了慎微之先生的关注。1934年，湖州大旱，钱山漾湖底大面积干涸，慎先生趁此机会采集了大量石器，并于1937年先后在《新湖州》和《江苏研究》上发表文章，对钱山漾的考古前途及与其他古文化比较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钱山漾”之名始为考古界所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又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丝麻织品等有机物遗存，引起考古界与丝绸学界的高度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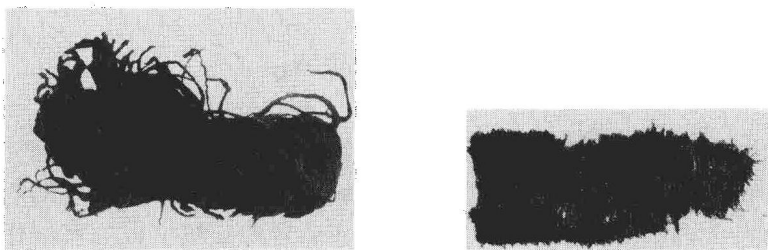


图6：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线与绢片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发掘，第一次是在1956年3月，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进行，在第四层中出土了云雷纹黑陶豆柄、黑绘回纹残石斧、鬻形器、陶纺轮、花生、绢片、丝线、麻布、木杵等，出土的竹编器比较完整；第二次是在1958年2—3月，在探坑22号中出土珍贵的丝麻织品，如麻布残片、细麻绳、绢片、丝带、丝线等，大部分都保存在一个竹筐内，此外，在探坑12号和14号中也有少许麻布残片出土，这些丝麻织品除一小块绢片外，全都炭化，但仍有一定韧性，手指触及尚不至于断裂。^①一部分标本曾送请有关纺织检验机构，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于1960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对这些丝织品作了鉴定。^②其结论如下：

(1) 绢片：未完全炭化，呈黄褐色。原料为蚕丝，平纹组织，交织密度为经线每英寸134根，纬线每英寸122根。经纬丝粗细相仿，分别由20根左右的单茧丝合并成一根股线交织，无捻度。织物表面细致、光洁，丝缕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② 徐辉等：《对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的验证》，《丝绸》1981年第2期。